

经济学是最有希望冲击世界一流的一个学科

■ 田国强

▶▶▶[上接 03 版]

比如,现在有人认 为依靠政府来推动中国的“工业革命”就可解决问题,更多人呼吁采用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可解决当前的经济下滑趋势。这些观点都以为不用重视长期治理的市场化改革,就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就能扭转经济增长持续大幅下滑的困境。这可能吗?又如,许多学者以发展收入论论证中国还需要经济增长优先,而忽视收入分配和环境保护等,乃至以发达国家历史上由于认识不足和法律缺失而形成的“先污染、后治理”来为中国的 环境污染进行合理性辩护,不顾现今的国际国内法律约束。这会将中国引向何处?

再如,有学者认为文化上的比较优势是中国经济比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增长得更快的原因。那么,这种观点如何解释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的停歇不前呢?为什么不按照实验物理学的基本方法论来谈差异因素?不 从多重因素和综合治理因素的“水桶效应”来解释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增长呢?客观而言,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当然,由于只是遵循了发展的逻辑,没有注重治理的逻辑,导致问题很多、很严重),就是基本上放弃了计划经济,实行了松绑放权的改革,也就是政府的干预大幅度地减少,民营经济大发展而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再加上文化等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取得的。

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包括一些从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家自以为是地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经济学中的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的某点知识,就给出需要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多方面综合治理才能解决的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建议,这样给出的建议可能短期有效,但中长期副作用可能更大。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学者常常以过渡性体制机制安排作为参照,而回避经常性目标体制(如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忽略达成目标体制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甚至用产业政策消解制度改革,用局部改进代替综合治理,从而破坏了思想界和学术界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合力,客观上对既得利益集团将过渡状态终极化起到了助力作用。因此,这种短期、局部的制度安排即使有一定作用,但从长远和动态来看,弄得不好会造成很大甚至不可估量的负面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 创新依然任重道远,但是创新和发展不是靠推倒重来和全盘否定,而应该是基于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上的边际创新或组合创新,技术和应用创新往往就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石上对现有技术的重新组合和推广,就像不同的中药组合形成新的药方一样。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一定是基于前人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经过比较、拓展以及基于经济现实的检验和修正而发展起来的。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各国历史、文化、思想等在各自国家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三）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研究发展在三个方面的可能创新

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学家至少可从三个方面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做出新的贡献。

一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充分挖掘和现代阐释,为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补上中国篇章。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而富有光

辉成就,这些古代经济学思想异常深邃,许多现代经济学所论及的思想,我们先哲们早已论述到,这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而且也 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些先行思想要素。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古今中外的语言隔阂,中国经济学学术发育的迟滞和话语体系的不兼容,再加上传统经济思想主要是经验总结,没有形成严格的科学体系,没有给出结论成立的范围或边界条件,没有建立严格的内在逻辑分析,因此很少被外人所知,国际上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认知总体上还非常片面。实际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其合理内核和积极要素值得进一步挖掘。

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理念,完全是从西方灌输过来的,是西化。其实不然,早在上古时期的中华文化中,中国就有许多思想家崇尚朴素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信奉价格由市场决定,包含了许多市场经济的理念,给出了许多激励相容的辩证治国方略,总结得异常深刻。现代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基本思想、核心假设及基本结论,如个体自利性假设、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的无为而治、社会分工、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发展与稳定的内在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古代先哲们差不多都论及到了。如早在三千多年前,姜太公姜尚就认为,“避祸趋利”是人之天生本性,“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从而说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之”(《六韬·文韬·文师》)的以民为本的民富国定、民富国强的辩证统一思想 and 治国的根本规律,给出了政府要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的根本治国方略,达到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的激励相容的结果。这类例子还有其多。

准确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基本特点、理论贡献与国际影响,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有助于跳出单向度的“复制”“借鉴”“国际接轨”的经济学知识引进和学科发展路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助于从经济思想的角度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因此,基于国际学术规范和语言表达习惯的中西合璧的研究和译著,对于提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西方国家传播的有效性无疑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中国经济史学界已有不少这样的尝试,通过与国际知名学者的学术合作来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走向国际。如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王昉副教授与 Terry Peach 合作主编的英文版论文集“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梳理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和特征,深入阐述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历史发展规律、价值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由国际知名的 Routledge 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又如,北京大学张亚光副教授与 Guo Fan 和 John Whaley 合作撰写的 NBER 工作论文“Economic Cycles in

Ancient China”,基于农业数据与理论思想文化研究了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经济周期。

二是以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推动经济学学科本身的发展。尤其是要推动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目前,中国很多经济学研究还停留在对策应用研究或对经济政策的解释上,纯理论、公理性理论方面的贡献严重不足,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短板和遗憾。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科学理论的进步。那些基础性的、原创性的以及具有共性的经济 学理论和工具方法的研究和创新,没有国界,具有一般性,其重要作用在于它们中的一些理论,如消费者选择理论、厂商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基准点和参照系;而另外一些理论,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等,则为研究更现实的问题提供了一般分析框架。

实际上,中国高校由于过去 10 年来大规模地引进经过系统的、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目前已集聚了相当一批这样的经济学者,他们所做的是具有非常一般性的、没有很多国别色彩的纯经济理论研究,尤其是在解决现实市场失灵的所谓的市场设计(即拍卖和匹配)的理论 与实验研究这个领域,已经涌现了大量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上海财经大学目前正与兄弟高校积极筹划,力争围绕该领域形成经济学科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与那些“短平快”的研究相比,这些基础经济理论研究往往需要坐“冷板凳”许多年才能出成果。但是,这些成果由于其前瞻性,常常能够发表于国际顶尖和一流的经济学期刊,并且其中一些成果已具有相当高的被引数,为国际学术共同体所接纳和认可。

需要指出的是,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论研究通常需要借助大量的数学分析工具,这招致一个常见的批评就是现代经济学太注重数学,越来越数学化、统计化、模型化,使问题更加晦涩难懂,由此批评现代经济学的严谨性和数学性。为什么现代经济学要用这么多的数学和统计?就是为了严谨性和实证的量化性,给出其边界条件和适用范围,正如前所述,研究经济社会问题和给出经济政策不能轻易拿现实社会做实验,否则代价太大,因而需要严谨的内在逻辑推断的理论分析。尽管领导决策层和一般民众不需要了解理论严谨分析的细节或前提条件,但对于提出政策建议的经济学家必须要了解。这是因为,经济学理论一旦被采用就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如不考虑前提条件就盲目运用,会带来很大问题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因而需要借用数学来严格地界定其边界条件。同时,一个理论的应用或政策的规定也往往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再加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轻易拿社会做实验,因而需要有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

因此,一个经济结论的产生一般需经过三个阶段,即初始的非数学语言阶段、数学语言阶段和升 华的非数学语言阶段。第一阶段提出经济观念、想法或猜想,这些观念、想法或猜想可能由经济直觉产生或根据历史经验或外部经验而来。由于它们还没有经过理论论证,不知道其适用范围,人们可将它们类比为一般生产中的初等品。即使如此,这一阶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来源。第

二阶段需要验证第一阶段所提出来的经济想法或论断是否成立。这种验证需要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和分析工具给出严格的证明,如有可能,还需要得到实际经验数据的检验。这一阶段所得出的结论和论断往往都是由数学语言或专家术语来表达的,非专业的人士不见得能理解,从而不能为社会大众、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所采用。因此,将这些由技术性较强的语言所表达的结论和论断类比为一般生产中的中间产品。第三阶段就是将第二阶段那些由技术语言所表达的结论和论断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并使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深远意义及其具有洞察力的论断通俗易懂,从而为现实经济社会服务,这些才是经济学的最终产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都是用通俗、非技术、非数学的语言来给出经济想法和结论,但第三阶段是第一阶段的一种飞跃和升华。这 个三阶段式——由通俗语言阶段到技术语言阶段然后再回到通俗语言阶段——其实也是大多数学科所采用的研究方式。

三是基于中国经济的改革深化和转型发展,提炼升华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为现代经济学注入中国元素。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就是其内在逻辑体系,经济学家在此体系下就一定约束条件下如何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给出可行的和可操作的方案,同时在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和提炼的过程中,寻找一般意义和普适价值,进而又上升到理论层面。经济学的发展和 创新,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实现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经验,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各种理论,包括如何成功变革和避免失败以便中国能长治久安的综合治理的中国改革理论。

当然,由于 2007 年以来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危机,也触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理论的众多争论和所谓的反思,提出了诸如新结构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新养老经济学等许多新苗的经济学理论学说。其中,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教授通过其对传统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的反思而提出的,它给出了一个明显融入中国经验色彩和所谓后发优势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框架分为六步:第一,挑选参照国,参照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应与本国相似,但人均收入比本国高出 1-2 倍,甚至 3 倍;第二,选择目标产业,找到支撑参照国有过 20 年以上连续快速增长的曾经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第三,降低交易成本,如国内企业在这些可贸易行业已很活跃,就找出产业升级和新企业进入的瓶颈与限制,并采取措施消除它们;第四,扶持全新产业,找到国内企业已获成功的新行业,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包括软硬件基础设施)来降低交易费用,扶持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第五,在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较差的地方,将活动集聚在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第六,向先行企业提供有限制的激励,进行外部性补偿。

应该说,这一经济学探索已具有一定的理论雏形和可操作性,且没有照搬国外现有的第二类经济理论,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但不难发现,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和发展框架主要是基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而提出的,而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在世界上很难找到长远成功的先例。要真正成功实施,需要解

决看似容易而其实难以做到的一些前置条件:首先,政府需要有能力去鉴别自己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什么,继而决定去推动哪些产业部门的发展。问题是政府能做到么?这种政府推动、一拥而上的产业导向是资源配置有效的吗?其次,与前面点相交织的问题是,由于信息和激励的问题,政府官员能否发挥其在具体产业方向选择和协调中的作用以及是否会超出自己的能力行事?恐怕答案也基本上是否定的。除非政府官员有很高的市场敏感性,或本身就高度嵌入市场发展 中,否则他们可能会由于缺乏足够的必要信息和动力而难以做出明智的产业发 展抉择。这样就会有向任用亲信和腐败方向发展的倾向。前些年国内高铁建设的发展和政府主导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这一点。对于那些最贫穷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在笔者看来,许多所谓清新的经济学说并非对既有发展经济学及其他成熟经济理论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范式转换,其提出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一方面还缺乏实证研究的检验和支持,另一方面往往流于过渡性而缺乏终极和普遍意义,更是缺乏像基准理论那样强调改革方向 和让市场发展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向感。国家认为,既能让中国改革成功,又能最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让国家长治久安的研究方法和解决之道 的经济理论应是那些将指导改革方向 and 指明发展目标的基准理论与充分考虑国情而又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新的经济理论,并以此给出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也就是说,这样的理论,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既要有内在逻辑的推断,同时也要有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且还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总之,理论、历史和统计的三维度分析缺一不可。

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来研究与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尝试是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系列报告。此系列报告注重此三个维度的结合,力求体现三大特点:一是聚焦中国宏观经济中面临的重大热点、难点问题;二是基于扎实的数据采集整理进行严谨的计量经济分析;三是给出短期政策与对策和针对某个方面或领域给出中长期治理建议,实现短期对策与中长期治理互动互补的有机结合。课题组采取了国际前沿、国内较为独特的基于准结构模型的情境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es)和政策模拟(policy simulations)方法,在充分收集统计数据与经济信息和进行科学鉴别校正的基础上,对中国宏观经济最新形势进行严谨的分析,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客观的预测,并提供各种短期对策的情景模拟分析,从而既给出短期的政策应对,同时也给出中长期的改革方向 and 治理方法。笔者和陈旭东所合著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也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总之,任何成熟经济理论的提炼,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经济理论要具备指导意义,就必须要经过反复不断的检验,才能成为可以具有解释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理论雄心,以理论求真、实践务实的工具推动进行实 证量化分析的发展和 创新。 (完)

经济学“重生”需要的是理念上回归

■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邵宇 ■ 东方证券高级研究员 陈达飞

塞勒认为自利原则也不是完全有效的,人们会通过合作来产生共赢,甚至会无私地牺牲掉自己的利益来进行慈善捐赠。因此,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只是个非完全理性的个体。

所谓“行为经济学”,就是以“人的行为”为出发点,运用经济分析的工具反过来解构“人的行为”的一门学问。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是“理性人”的假设,而行为经济学则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塞勒,因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获得了 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理查德·塞勒将心理学上的现实假设应用于人的经济分析,通过探究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及自我控制的缺失,演示出这些人类特性如何系统性地影响个人决策,以及由此导致的整体结果。本文仅谈“有限理性”的理论意义。

反思经济学最基本假设

笔者的理解是,塞勒获奖或许可以看作理论界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反思的结果。从微观到宏观,主流经济学均建立在“完备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基础之上,认为人的理性行为会导致社会最优的结果,短期对“均衡”的偏离是一种合理的扰动,市场自身就会修复至均衡。基于理性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学自上世纪 70 年代在西方国家发生普遍“滞胀”现象之后就成为主流。在主流思想的影响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启了新一轮的金融自由化浪潮。从上世纪末的互联网到 2007 年前的房地产,一波接一波的“非理性繁荣”均被主流学界所忽视。就像卢卡斯在 2003 年说过的,人类已经告别了危机。但这样带有“庞氏骗局”色彩的繁荣是难以继的,金融危机就是一场清算。

危机之后,布兰查德和伯南克仍然认为这不是经济学本身,而是应用层面,也就是经济管理领域的错误导致的。但曾经被视为美国的“英雄”,也是任美联储主席时间最长的格林斯潘却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认为自己的经济模型存在缺陷,同时自己的思维模式又被错误的模型所钳制,导致了 对资本市场的创新失去敏锐的判断,最终只能由市场以危机这种激烈的方式做出反应。

那么主流经济学到底错在哪儿?为什么解释不了资本市场上的各种反常现象?经济学如果都不能解释现实了,谈何指导人们去改造世界?所以,从那些与主流理论预测不一致的人的“反常行为”出发,塞勒教授从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开始反思,找到了问题所在。

“理性”与“有限理性”

众所周知,在主流的古典经济分析框架下,无论是企业理论、金融市场还是消费者选择理论,个人在所有经济现象分析中均被假设成是理性的,同时会尽可能地追求最大利益。然而,现实中的个人往往依靠直觉来解决问题,而且就算人们谨遵各种假设,也会经常犯错误,所以说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往往是一种理想的、简化的假设。现实世界纷繁复杂,个体之间千差万别,不可能用一个假设束缚住所有个体。

塞勒认为自利原则也不是完全有效的,人们会通过合作来产生共赢,甚至会无私地牺牲掉自己的利益来进行慈善捐赠。因此,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只是个非完全理性的个体。除此之外,个人理性的加总对集体而言,并不是最优的,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现成的例子。面对伊丽沙二世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它(金融危机)?英国国家学院在

提交的学术报告中称,在孤立的状态下,似乎每个人的工作都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没有人看到大局,当个人的风险被合理地视为很小的时候,对整体而言风险确实是巨大的。每个人都从自利的角度出发去作出选择,但叠加到一起形成合力之后,往往是负面的结果。

所谓“行为经济学”,就是以“人的行为”为出发点,运用经济分析的工具反过来解构“人的行为”的一门学问。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是“理性人”的假设,而行为经济学则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差别真的有那么大吗?是的,这就好像人们戴着不同颜色、深浅也不同的太阳镜,他们眼中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假设对人们行为的指导意义是不一样的。再打个比方,你看到有人想不开,正在做“傻事”。如果你觉得人是理性的,那么你会觉得他这么做肯定是深思熟虑后的最优选择,你可能就不会去阻止。但是如果你觉得人是“有限理性”的,或者受到感性支配一下子犯了糊涂,你可能就会去劝阻。很多时候,人们的选择都是在自己掌握的有限的信息集里面作出的,所以都会存在“理性”和“不理性”的判断,这恰恰是因为人归根到底是个“感性”的动物,也就是“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在金融学中应用

理性假设在金融学中的应用的代表性理论是“有效市场假说”,由芝加哥大学尤金·法玛教授提出。该理论认为,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股票市场,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已经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股价走势当中,其中包括企业当前和未来的价值。除非存在市场操纵,否则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分析以往价格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不确定利润。

当然,市场的有效性是有等级的,分为弱有

效性、半强有效性和强有效性,逐次对信息的要求越来越强。市场机制的本质特征是“允许套利”,这种套利行为会使得价格向价值回复。单个人可能会出错,但是市场会纠正这种错误,所以不会出现价格对价值的持续偏离。但是这个理论太过于“完美”,以至于它无法解释很多现象。笔者以最著名的“黑色星期五”为例来说明,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故事的主角是英国的欧沃伦·格尼公司,这家公司被维多利亚时代的金融家们称为“转角银行”,坐落在伦敦的市中心。由于激进地开展新兴市场债券业务,公司已经滑入了破产的边缘。因为他们从银行借来了大量的资金对外提供融资,一旦银行知道企业经营困难而撤资,那么企业将进一步陷入困境。于是,合伙人决定“上市”,即使《经济学人》专门写文章指出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多么糟糕,但是股价在上市后还是翻了好几倍,因为公众根本就不会去阅读招股说明书,大家买股票的唯一原因是别人都在买。正在股价一路高歌之际,英格兰银行突然采取了紧缩政策,将央行基准利率提高到了 8%。恰恰在此时,另外一家公司沃森·欧沃伦公司发行的铁路债券违约,巧合的是这两家公司的名称太像,以至于人们猜测这两家公司肯定有关系。随即,欧沃伦·格尼公司的股票一泻千里,直至其破产(1866 年 5 月 9 日周四下午 3 点 30 分)。而且英格兰银行也没有对其进行救助,因为担心这会引发道德风险。欧沃伦·格尼公司的破产导致了灾难性的影响。第二天,人们心中的恐惧和焦虑引导他们纷纷去银行挤兑,这就导致了“黑色星期五”。此时人们的选择,并不会去考虑为什么,人们卖股票,仅仅是因为别人都在卖,人们去银行取款,也仅仅是因为大家都在排队取款。另一位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席勒教授也为行为金融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从对股票崩盘的问卷调查中得到的结论也证明,大多数股市参与者作出买和卖的择时点,都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塞勒教授对各种反常现象非常敏感,而股票市场恰恰就是寻找反常现象的好地方。他对股票的日历效应、美国股市的均值回复现象,以及封闭式基金的反常操作都做了深入的研究。根据弱势有效市场假说,一个投资者无法利用过去的价格信息来获得超额收益,也就是说股票价格纯粹服从随机游走。但是,塞勒教授发现了“输者输者效应”,即投资者对于过去输者组合过悲观,对过去的赢者组合过分乐观,导致股价偏离其基本价值,待一段时间之后市场自动修正,前期的输者将赢得正的超额收益,前期赢者的超额收益则为负。据此,他们提出了预测股票收益的新方法:采用反转策略,买进过去 3 年至 5 年内的输者组合,同时卖出赢者组合,这一策略可以使投资者在未来 3 年至 5 年内获得超额收益。

曾经是奥巴马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的著名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在金融危机后向白宫推荐了三位经济学家白之浩、明斯基和金德伯格。白之浩就是上文中《经济学人》的主编,明斯基提出了“金融不稳定”理论,金德伯格是经济史学家,其代表作是《疯狂、惊恐与崩溃:金融危机史》。他们都从经济现实与人的行为特征出发去研究社会现象,均强调了人的非理性色彩。但是这三位学者的理论并不被主流学界接受。金融危机已经过去 10 年了,主流经济学界仍然在原有的框架下缝缝补补,仍然没有重大的理论创新能够让经济学回归初心。笔者认为,这次诺奖颁发给塞勒教授至少是一种包容的体现。经济学的“重生”恰恰需要的不是模型上创新,而是理念上回归。